

也是排
女排
人心

说唱文化 破壁 2020：《叫爸爸》《来自世界的恶意》靠什么走红

这很符合Z世代的某种精神内核，敢思考、敢言说。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2020年，说唱热又起。最近，《说唱听我的》《中国新说唱2020》《说唱新世代》，三档说唱类音乐综艺节目的相继播出，既进一步让原本小众的说唱走入大众视野，同时也为这种音乐形式注入新的内核。

3年前的夏天，《中国有嘻哈》横空出世，带领说唱音乐由小众走向主流，让freestyle、Skr、单押、双押等说唱相关的专业术语实现大众普及，成为新晋流行语和年轻人的社交货币。如今，中文说唱的热潮，正在席卷更多年轻人。

近年来我国的青年亚文化现象开始不断涌入到主流视野，包括在过去一直处于地下或半地下状态的喊麦、说唱、街舞等青少年群体热衷，但又明显处于边缘状态的亚文化文艺表达方式，获得了主流媒介的持续性关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说。

当初《中国有嘻哈》主打的态度是，说唱就是keep real、做自己，该系列做到第四年，今年《中国新说唱2020》的节目slogan——who is the rapstar?冠军是我的！

《说唱听我的》告诉观众，说唱是自己说了算，勇于面对质疑证明自己；B站的自制综艺《说唱新世代》主打的观念是：万物皆可说唱，说唱是一种表达态度和想法的载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注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9月23日，洛阳龙门西山的奉先寺北壁，一件佛首被龙门石窟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安放到一尊等身立佛的残像上，断面完全吻合，佛首回归。这次回归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佛首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用3D数字打印的，这是国内石质造像流散文物首次实现数字回归。

这件佛首馆藏于上海博物院，早在1957年在北京购得，推断被盗于1923年后。因为1923年，一名日本摄影师曾到龙门拍过奉先寺北壁照片，当时这尊立佛佛头尚存。这只是龙门石窟众多流失海内外的造像中的一件，但佛首的数字回归，为流散文物回家提供了新的可能。

9月26日，数字重生 丝绸之路沿线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在龙门石窟寺数字化保护项目启动仪式上启动。对石窟寺来说，数字化的意义不仅仅是流失文物的回归，它更关系到石窟寺的未来存续。

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说，历经一千多年，石窟所面临的水害侵蚀、岩体失稳及石雕表面风化等自然病害，仍难以遏制；历史原因造成的被盗凿、被破坏、被偷窃，大量精美的佛像、佛首、壁画等，现在还流失海外。保护项目将选取丝路沿线具有不同时代意义、不同地域代表的石窟为实施对象，进行洞窟数字化、虚拟修复、数字回归、展览展示等方面的探索。

励小捷宣布，项目首批选定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为期6年，

人物

宁浩：《我和我的家乡》跟每一个小人物都有关系

一直以黑色幽默 荒诞 疯狂 为创作风格的宁浩，最近的作品多了些温情的底色。

实习生 余冰珂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外地亲戚进城来看病，这事儿大家经常遇到，导演宁浩也遇到了。除了对疾病的忧心，亲戚还担心在北京看不起病，虽然有农村医保，但是不知道能报多少，北京是否覆盖，便不敢做手术。宁浩说，你别想后面那些问题，我们可以帮助你。

可一旦涉及金钱，平等的亲戚关系似乎多了一点亏欠，这让宁浩有点尴尬。等到做完手术，亲戚惊喜地发现医保可报销百分之八九十的费用，一下如释重负。亲戚又回到长辈的位置上，双方重新平等了。

这事对宁浩触动很大，农村医保惠及农民，确实是政府办的硬事。在接到《我和我的家乡》命题小作文任务后，宁浩觉得可以从这个角度讲一个异乡人的小故事，于是就有了分单元《北京好人》。



陈近南参加《说唱新世代》。

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静指出，近年来说唱热的出现，离不开网络新媒介的包装与传播，尤其是网络音乐综艺节目的助推。以2017年的网络综艺《中国有嘻哈》为界标，作为嘻哈文化重要分支的说唱，才开始走进当代大众文化的视域之中，并散发出前所未有的吸引力。

李静认为，网络亚文化对于文化生态的改头换面之一，便体现在它对日常语言的渗透中。比如网络说唱节目中涌现的battle、diss、freestyle、keep real等，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网络社交用语，甚至化入线下交际之中。

很多网友对创作型说唱选手的评价

是，他们实在很敢：敢写，敢唱。比如在《说唱新世代》中，RoseDoggy组合的迪克阳仔和林原凉带来一首此前没人敢写的说唱歌曲《客户爸爸》，围绕现在大家都对客户甲方叫爸爸的社象，他们进行一种戏谑且魔性的表达。

我们在广告公司里面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确实也会碰到很多人为了了一些东西去讨好媚别人，去低声下气叫别人爸爸，比如大家常说的客户爸爸。因为这种现象在我们的行业里普遍到让人以为习以为常了，为了得到一些东西去放弃底线，我们想借这首歌小小地讽刺一下。

接受本报采访时，谈到创作《叫爸爸》这首说唱作品的初衷，RoseDoggy组合如

石窟寺数字重生

存纸质档案的数字化采集。数字化技术，除了能记录石窟的真实变化，还可以做整体风化监测、修建窟檐之后风化速度大大下降，而如果很多很多年以后，云冈石窟真的消失了，如果有足够精细的数据保存并传承，人类还会知道并看到这里存在过如此灿烂的艺术。宁波说。

从2005年开始，北京大学教授查红彬与龙门石窟合作从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尝试。建立石窟三维数字化的数据库，利用三维数字技术辅助考古线路的绘制，最终实现石窟全景数字化，这是查红彬团队目标的第三步走。他为我们描述了将来一种参观石窟的神奇体验：走进一个石窟，戴上VR头盔，就能看见这个石窟100年、500年、1000年前各是什么样子，历史重现。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黄先锋，2007年与敦煌合作，扫描了整个莫高窟1.8公里的数据，不仅是石窟，还包括周边环境，空地一体化，这成为向游客虚拟展示的基础。当时的投入是巨大的，工作量也是很大的。文物消亡的速度远远大于我们现在进行保护的力度，除了重视重点文物，还要看到边疆和条件较差的地区。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软件，放到云上共享，手机就能打开，每个人都可以上传照片，建模以后直接分享，实现低成本的数据记录。

黄先锋说：现在做的数字化，可以让数字化和展示直接打通，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数字化不只是模型，文物信息挖掘和知识库的建立任重道远；数字化的成果也不只是看，是真的能够用于保护的。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唐长法认

是说。

RoseDoggy组合表示，希望以这种角色扮演的唱法，让大家感受到叫爸爸这种现象是他们看不起的。每次唱完现场，叫完爸爸之后，他们想告诉年轻人：每个人只有靠自己努力付出和奋斗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才是值得被尊重的。

电视研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何天平认为，说唱形式相较于唱歌、跳舞，能承载的最不一样的东西，是态度和表达。恐怕没有哪一种艺术样式，能比说唱更直观有力且直抒胸臆地去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这也符合Z世代的某种精神内核，敢思考、敢言说。

说唱节目中，陈近南唱的一首写给抑郁患者的歌《来自世界的恶意》，唱哭了很多网友。

《来自世界的恶意》歌词有对抑郁症女孩的理解和同情：命运是主人，你都是往来的宾客，我和你一样曾遭受校园和网络暴力。更令网友泪目的，是陈近南对这个群体的鼓励：你看你有多棒，你一定会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这不是你的问题你无需向谁证明，世界的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如果现在你只剩下多少勇气，我一直陪你，愿你历尽千帆，依然光芒万丈。

接受本报采访时，陈近南谈起创作《来自世界的恶意》这首歌的初衷。如果在这条路上你觉得辛苦，觉得困难，觉得支撑不住了，至少还有一个播放器的声音会陪着你。

2019年5月，陈近南有一个粉丝在加拿大留学。突然有一天，陈近南收到了她的消息。她说坚持不下去了，活不了了，她不懂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恶意满满。她确诊为很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学校里的同学们都不理解，父母一开始也不觉得她生病，只是觉得她很作。

为，数字化是一场不知不觉的方法革命，在文物保护过程的多个维度延展，随着实施的推进，需要我们有更深刻的人文思考。

唐长法总结，数字化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全过程包括基础研究、保护修复、监测预警、利用发展、宣传推广、阐释展示等。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重庆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在修复时就留取了修复前、中、后多层次的亚毫米级数据，实现了有数字化支撑的石窟修复。

但必须看到，文博领域数字化还存在为记录而记录的现象，因需求不明确，或反复采集，或将数据束之高阁。而许多急需数字化采集建立档案的遗产地，往往又缺乏专业人员，这使得数据交付后无人管理。唐长法直言，市场有市场的逻辑，行业有行业的困境。今天数字化在文物领域的广泛应用，并未真正获得与投入相匹配的效益。

比如，2017年，瑞士西北部的巴塞利用3D扫描和打印技术整体复原出了埃及法老塞蒂I世的墓碑，及3300年前的法老石棺。该项目耗时5年，让法老陵墓完整地以高科技的方式再现世人眼前。

这在云冈石窟已经实现：2017年以来，依托数字档案，云冈石窟启动了第3窟、12窟、18窟原比例复制工程，用3D

陈近南听这个粉丝的讲述很心疼，就把小时候自己曾经遇到的问题讲给粉丝听，给她鼓励。她接收到了我的力量，并且看到了我现在的样子，好像所谓来自世界的恶意，我没那么难接受了，她想成为和我一样勇敢的人。

当晚陈近南就想，也许有很多人，和这个粉丝一样，在青春期这段时间，很容易不开心或者有一些心理问题，他们也需要鼓励和安慰。但是我又不能一个个和他们讲我的故事，鼓励他们，所以我就创作了这首歌《来自世界的恶意》，很快就写了出来。

陈近南把这首歌最初版demo发给那个粉丝听的时候，对方正在机场候机。她说决定休学一年回国接受心理治疗，本来很紧张，但是听完了以后就觉得暖暖的。我也很开心，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都能得到一点点的温暖。

透过《来自世界的恶意》陈近南想传达的是：也许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感受过来自世界的恶意，我们要勇敢地面对它，克服它，战胜它，不要害怕。也许当你战胜了它，你也会觉得，来自世界的恶意不过是一场闹剧，那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在何天平看来，类似《说唱新世代》这样的说唱节目，是体现包容性的一种价值表达。节目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作品，在情感、价值和文化的提取上需要去寻找一个最大公约数，能被所谓的大众而非小众去共情，把说唱放到一种社会文化的语境里去解读，这又何尝不可？

何天平表示，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说唱和rapper依然是圈层文化，它有自己的壁垒，包括专业和审美门槛，不可能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能被大众普遍共享的文化表达。但各类说唱节目确实在传播层面为这种原本的青年亚文化祛魅了，这种传播意义上的大众化是显而易见的。



云冈石窟第20窟西立佛虚拟修复示意图

打印技术，陆续将石窟搬到了青岛城市传媒广场、北京建筑大学、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等地，实现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可移动展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注定消失的石窟将得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永生。

在结构、诉求、价值表达这三个方面找准，影片就基本立住了。剩下的考验是细节的呈现，《夺冠》有几个细节抓得不错：比如一名打沙滩排球出身的运动员在发球前喜欢转球，还因此被裁判判罚超时；比如新女排队员被郎平批评，说老女排队员从来不会在训练时拍对方屁股，这样的细节让观众大笑，也让影片变得轻松、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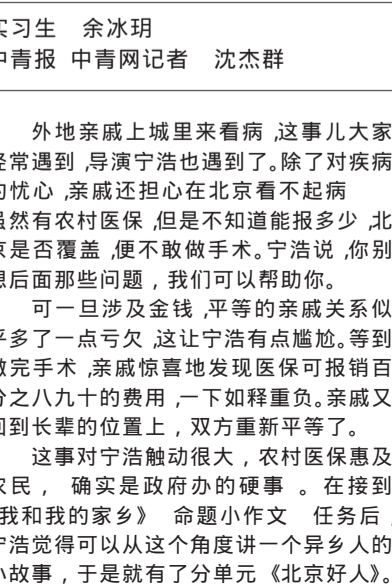
作为一部新主旋律电影，《夺冠》如何处理集体和个体的关系，考验着创作者的立场与技巧。在最后一段，显然《夺冠》明确了球员为谁而打球的问题。不是为了爸打球，不是为了奖牌打球，而是为了改变和提升自我而打球，也正是这样的激励，最终让最年轻一代的球员，做到了轻装上阵。她们丢掉女排精神了吗，并没有，她们只是将女排精神进化了。她们表达出爱国情怀了，当然是，虽然没有喊口号，但她们的胜利以及她们带给自己以及带给观众的喜悦，本身就可以含蓄地激发爱国情绪。

回到电影本身，《夺冠》的缺憾也是有的，比如第一段故事里的队员都没有出场名字，不管什么原因，听不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总是一种遗憾；在对比赛画面的呈现上，镜头有时候没有跟着球走，没能协调好比赛的全面与局部之间的关系，剪辑方面略显不足；虽然多数演员都超预期地完成了表演任务，但个别角色还有脸谱化的嫌疑。

作为一部体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主创群体能将《夺冠》以现有水准捧出来，已经算不错了，如果对女排历史有好奇心或者对女排队员有亲切感，影片的能力会更强些。在国庆档，期望《夺冠》能接棒《八百》，继续为国产片提气，把疫情之后恢复的电影市场，进一步带热。

中青报 中青网：这部电影有喜剧的外壳，内里包含许多对现实的思考，你在平时创作的过程中也会有这样的坚持吗？宁浩：我没有故意思考现实，也没有故意在做喜剧，我其实就是在对真实负责。什么是真实的东西？你要是这么想问题的话，肯定是在看到事情表面的时候，愿意去想它的原因，它到底为什么这样。想多了自然会带出一点表面以下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中青报 中青网：你曾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难的是保证永远有话要说，你如何保证这种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宁浩：一个是不要说，另一个是尽量少说废话，虽然我也说了不少废话，但我觉得重点是在你关注什么事情。比方说这个世界真的在发生什么？它的真相是什么？我在研究我的下一个片子，抓了一个题材代孕。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是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来了对于很多环节的重新思考，包括伦理，包括法制，很多问题都要与之相配套。这种事情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事情，去观察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



宁浩